回憶田野工作

黃淑娉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本文是根據黃淑娉教授 2003 年 3 月 14 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講之「我的五十年田野工作經驗」整理而成，內容作了一些調動和刪節。初稿蒙黃教授修正及補充，不勝感謝。文章整理過程中得馬健雄提供意見、湛蔚晞協助文字處理，謹致謝忱。文章內容若有錯漏之處，皆屬整理者之責任。整理：廖迪生]

人類學對科學的貢獻，來自其獨特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儘管別的學科也作實地調查，人類學的調查研究還是有其獨特之處。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功」，通過實地調查得到第一手資料，然後結合歷史文獻、文字記錄、考古材料來進行研究分析，瞭解人類社會。

我從二十多歲開始跑田野，一直跑到七十多歲，最近這幾年遠處跑不了，就去珠江三角洲。五十年的田野調查工作，經驗說不上，但可以談談回憶，與大家分享。我在香港出生長大，1947 年去北京燕京大學唸書，1952 年 7 月畢業。當我還未領到畢業證書，便出發參加調查工作了。那一年，正進行大規模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各校不招研究生，所以畢業後也沒有機會繼續唸書。我的研究經驗是隨老一輩人類學家學習而累積的。

從 1950 至 2001 年，我的田野工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 40 年是研究我國的少數民族，後十年是研究漢族，所以我的研究可以說是由「異文化」開始，繼而轉到「本文化」。1950 年，我參加了第一次實地調查，為期兩個半月。這是由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進行的內蒙古實習調查，由林耀華先生率領，參加的有同學和年青老師共 25 人。除了內蒙古之行外，我的研究大都在南方進行，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前期在兩廣、兩湖、浙江和福建等中東南地區進行，後期是在西南地區的雲、貴、川。90 年代則主要是研究漢族。

從 50 年代初開始，我們的田野工作就沒有停，也在這裏舉一些例子來說明。1952 年 7 月前往湘西和廣西，翌年 3 月才回到北京，但剛放下行李，東西還沒有整理好，就再出發去福建和浙江研究畲民的民族成份問題了。我們一行三人，3 月去，6 月回來。1954 年 5 月又去雲南，一去便是半年多。那個時候，出差期通常在半年以上。有些男老師還要進行比較長時間的調查研究，甚至一去兩、三年。出發的時候，太太懷孕或小孩子剛出生，出差回來時小孩都會說話了，到晚上小孩問：「媽媽，叔叔為甚麼還不走呀？」雖然我們女老師在出差期間上有些優待，受到照顧，但我們還是很羨慕那些出差三個月便能回家的同事。我們的研究一個接著一個，1954 年底回到北京後，1955 年初便隨楊成志先生去廣東，繼續做畲民的研究。

從那時候開始，若以每十年為期計算，每期我都進行長期及短期的調查工作，曾對蒙古、苗、瑤、畲、壯、侗、傣、黎、彝、哈尼、納西、摩梭、基諾和布朗等十多個少數民族進行調查。我的田野工作，可以歸納為三個研究重點：第一是認識少數民族的不同文化類型，第二是區分民族的標誌，第三是瞭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方式。當然，在個人感性層面上，自己在田野工作中也有深切的體會。

內蒙古實習調查

正如前述，1950 年夏天，我參加了燕大、清華、北大師生的內蒙古實習調查。內蒙古在 1945 年解放，1947 年 5 月 1 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自治區政府對我們做調查的學生和研究者，都給予特別的關照，食宿和旅行費用都不用我們支付。我們首先前往海拉爾，然後進入我國有名的呼倫

貝爾草原。首項任務是接受騎馬訓練，因為不騎馬的話，甚麼地方也去不了。那時候還沒有進行民族識別工作，我們那次的調查對象後來分別被識別為蒙古族、達幹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和源自西伯利亞的俄羅斯族。我在香港長大，這是我首次看到牧區和獵區的風光，跟牧民一起生活，感覺非常特別和新鮮。我們有時候騎馬，但更多的時間是乘坐兩個大軲轆的牛拉車，在草地上行進。木板車上搭一個拱形木架，圍以毛氈，就成為座位。晚上，我們也會睡在牛車的木板上，真是一物二用。

一個人躺在草地上，望著無際的草原，看著不見邊的天，景色就如詩歌中的描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牧民也教我們唱他們的歌，現在腦海中還有「我們曾有過自由的時光」，「天涯芳草遍牛羊」，「那裏有水草那裏走，我們的家在馬背上」等民歌的餘音。現在跟人類學系的同學談起這些情況，他們都會說：「多瀟灑、多浪漫呀！」其實直到1980年代，我們田野調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都是頗艱苦的，沒有甚麼瀟灑浪漫可言。

在內蒙古做實習調查時，是我第一次撰寫民族誌。那時候對牧區有很新鮮的感覺，在調查中，初步學習掌握國家的民族政策，培養了對老百姓和牧民的感情，特別是產生了學習人類學的濃厚興趣。我們寫了一個集體調查報告，但當時並沒有出版。 1997 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將報告出版，書名是《內蒙古呼納盟民族調查報告》，那是 47 年後的事情。今日的社會已經不同了，但這些實地田野材料也就成為具有資料價值的真確記錄。

湘西、廣西地區

50 年代初期，國家要解決國內有多少個民族的問題。 1952 年夏天，我們幾個同學，包括三個從香港去北京唸書的，沒來得及參加畢業典禮便出發做研究了。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湘西，研究工作開展前，參加了該地成立自治州的典禮，該地初時稱為「湘西苗族自治州」，後來改稱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當時湘西的物質非常困乏，交通很不方便，從所里(今稱吉首)到古丈的一段，山路非常陡峭，光兩條腿走不成，要用手抓著旁邊的小樹，才能登山。一天要走八、九十里，我當時發高燒，但還是要向前走。選點做調查，然後寫成調查報告。以現在的術語來說，我們當時是去瞭解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去掌握民族文化特點在甚麼地方表現出來。調查報告是集體寫成的，寫好後，交一份到當地政府，交一份給中央，自己也沒有存留報告。

之後，我們轉到廣西，當時廣西要成立壯族自治區，我國除了漢族以外，壯族人數最多，有一千多萬。「桂西壯族自治區」在 1952 年底成立之前，我們先做調查。後來改稱自治州，至 1958 年成立了包括整個廣西的壯族自治區。他們早期的族稱是「僮」，為免於與「書僮」的「僮」字相混，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改以「壯」字為族名。我們當時在中越邊界、憑祥和寧明一帶進行宣講，向當地百姓闡釋壯族的歷史和文化特點、講解壯族成為少數民族的構成元素。一般老百姓和農民對甚麼是少數民族都不甚瞭解，只知道自己是講土話的；但知識份子則有比較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覺得自己跟漢人是不一樣的。

畲族地區

1953 年，正好是 50 年前，我們去福建廈門漳平研究畲族，一行四人從廈門沿海出發，坐的是一隻小艇。那時候台灣海峽軍事情況特別緊張，經過金門、馬祖時，剛巧正在打砲，小艇進退不得，我們就卡著在那裏，現在說起來，猶有餘悸。

福建的山區比較多，畲族都住在陡峭崎嶇的山區內。我們去漳平山羊嶋調查，「嶋」是小路，「山羊嶋」的意思是指只有山羊才能夠走的路。我們由山底下向上走，路很難行，我們都只顧向上爬，走了大半天。那時候，山上最老的居民只有五十多歲，很多人一輩子也沒有下過山。他們蓋的房子都是杆欄式的，適應炎熱的氣候環境，但人住上面，牲口住在樓下，衛生條件很不好。現在二十一世紀，情況改善了，牲口都在另一個地方飼養。

山上的人需要外邊的鹽，人不吃鹽便活不成。所以過去只要山下的人斷絕鹽的供應，便可以把山上的少數民族封鎖住了。在那次研究，讓我理解了畲族為甚麼老是要遷徙，他們是被迫著走的。由明代開始，他們便自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地區，自粵東鳳凰山，向福建和浙江那邊走。

兩年之後，在 1955 年初，由楊成志先生帶領下，我們去廣東繼續做畲民的識別調查，研究他們是不是少數民族。因為福建、浙江的畲民都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粵東的鳳凰山。楊先生領著我們由廣州出發，然後往東走，一直到鳳凰山，調查了 8 個縣十多個村子。

彝族地區

1954 年我們在雲南研究彝族，當時全國申報的民族名稱有四百多個，其中的 70 多個後來被定為彝族。雲南的民族情況比較複雜，研究雲南彝族有三個必須進行調查的地方：一個是小涼山，二是雲南中部，三是雲南東南部彝族跟壯族聚居的文山地區。我參加了這三個地方的調查工作，首先前往文山，然後轉到中部的大理、下關一帶，之後到麗江調查納西族，然後就進入小涼山。我們不可能每天都走路，而且沿途有老虎出沒，可以的話，我們都僱馬幫，騎馬上路。從麗江出發後，要走非常陡峭的山坡，走到「對腦殼」，腳下便是金沙江峽谷，景色壯麗澎湃。我們順著陡坡下山，過了鐵索橋，便到達永勝，該地前稱「永北」，為免「北」字的「敗北」含意，改稱為「永勝」。我們在永勝縣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後，便進入小涼山。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還未在該地建立，彝族奴隸主各據山頭，外人不能進去，政府也只能在邊上設一個辦事處。我們到了辦事處，便預備針線和毛巾等小禮物，作為送給奴隸主的見面禮。林耀華先生是組長，我們每人配一匹馬，各自管理，便跟著向山上進發。當我們走到他們的山頭，奴隸主便派遣管家接待我們。女性在小涼山社會沒有地位，我能夠跟男的坐在一塊，是因為我是工作組的一個成員。奴隸主要宰一頭羊來招待我們，管家便把一頭羊拉出來給我們看，林先生說好。他們很快便把那羊宰了，羊肝是烤的，羊肉是大塊的煮，每塊有兩寸見方，肉煮得不太爛，叫「陀陀肉」，是彝族的美食。席上還有蕎麥粑粑等佐食。被稱為「呷西」的奴隸一直蹲在下面，不敢抬頭，當奴隸主或管家高興的時候，便把一小塊蕎麥粑粑扔到他們面前，掉到誰的面前誰就可以撿來吃。

工作組由不同學科的成員組成，有來自歷史學、經濟學、語言學的，但主要的是文化人類學者。我們工作的目的是解決民族識別的問題，找出彝族認同的標誌。小涼山有很長的歷史，但漢人基本上進不去，漢官、流官進不去，土司不能久留。該地保留了彝族傳統文化中比較地道的東西，並使用老彝文。我們當時是要瞭解他們的社會文化特徵，例如他們的奴隸制度、婚姻制度、和語言系統等，書寫彝文也是一個重要的彝族認同標準。但近年一些學者對彝族的研究，都不提彝族奴隸制的問題，我不太清楚他們的依據是甚麼？

縱然漢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剛在 1954 年完成，國家並沒有打算馬上在彝族地區進行土地改革。當時民族工作的方針是「慎重穩進」，不以漢族地區的改革模式套在少數民族身上。在漢族地區，工作組串連窮苦農民，通過他們來開展工作。但在彝族地區，奴隸制之下，我們要溝通奴隸主，給他們送禮物，奴隸主回訪時，我們還從公安局取回大煙——鴉片來招待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主動到奴隸家裏，訪問也只能由他們的管家領著進行，全面的調查就跟本不可能展開。當時負責養豬的奴隸就在豬圈跟豬住在一起，衛生情況之差，令人沒法忍受。而我就是特別愛招跳蚤，不一會兒，跳蚤都往我身上來，弄得我在田野調查時很惱火。後來我才知道，政府還沒有在我們訪問過的地區進行社會改革，這裏卻先發生了叛亂，而一個奴隸主的兒子在參加叛亂時給開鎗打死了。30 年後，1980 年代中，我跟林耀華先生去西昌開會，並訪問大涼山，當地的情況跟我們當年在小涼山所見的完全不一樣了，可以說是換了人間。

傣族地區

在幾十年裏，我在語言屬於壯侗語族的少數民族地區，總共進行了 24 個月的調查，在其他民族地區的研究也有二十多個月。我感覺廣東與百越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對壯侗語族的田野調查，我有著特別深的感情。當我在壯族和傣族地區做研究時，都學當地的語言，方法就是記下他們所說的，不斷的記，不斷的學。我學得比較快，聲調也掌握得比較好，人們都稱讚我說得好，這可能是壯侗語跟廣州話有著密切關係吧！

在田野調查中，我對傣族文化的印象特別深，感情也特別投入。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和地方環境非常好，氣候有一點像廣東的南部，該地是一個天然的動植物園。我說的事情好像很零碎，但實際上，當我們在調查中體會民族文化時，我們除了看見他們的物質文化外，他們的各種社會文化制度、精神方面的藝術形態概念、價值觀和不同的觀念體系等，都不是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而是要透過我們親身的經驗去感覺。

傣族的服飾特別漂亮，當車子越過瀾滄江，快要到西雙版納自治州首府景洪時，遠遠的便可以看見穿著裁剪得非常合適的衣服、頭上包著頭帕、下身穿著「桶裙」的窈窕傣族姑娘。漂亮極了！做田野時，我也曾穿上她們的衣服，拍照留念。在傣族農村吃烤魚，雖然樣子沒館子的好看，但是味道卻沒話說。還有那河邊的青苔、各種野生植物、野菜和螞蟻蛋等都很有特色。周恩來總理去傣族地區的時候，他們也用螞蟻蛋來招待他。傣族人很會做小買賣，一到了墟期，就會擺賣東西和熟食。1977 年，「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在猛海縣的猛遮趕集，那是邊境地區的集鎮，墟期來趕集的便有幾千甚至一萬人以上。

傣族信仰小乘佛教，每條鄉村都有寺廟。他們流行跳孔雀舞，孔雀美麗而善良，是一個吉祥的象徵，孔雀舞表現了傣族美麗、善良、愛好自由的民族性格。傣族地區還有忠誠及愛好和平的大象，一個原始森林裏可以有幾十頭野象，牠們跑起來可以很快，一個小時可以跑六十多公里，牠們就在中國和緬甸兩邊的原始森林中奔馳，傣族地區的大象改變了我對「大笨象」的感覺。我對傣族文化一直留有很深刻的印象。

據說雲南有 24 個平壩，昆明是第一大壩，第二是猛遮壩，我一個人曾在猛遮壩住了一段時間，那時經常在晚上或半夜時聽到敲打芒鑼和象腳鼓的聲音，雖然敲擊旋律不複雜，但卻扣人心弦，至今每當我一聽到芒鑼、象腳鼓或其他傣族音樂的時候，我便很動感情、很神往。

在傣族地區，我在很多村寨做過調查，他們有很多獨特的事物，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自治州首府景洪縣旁邊的曼景蘭，便是一個經濟發展得特別快的典範村寨。另一個例子是他們從前的領主和寨子關係，在封建領主管轄下，每個人頭上的每一根頭髮都是屬於領主的，一切都是歸最高領主所有，這個寨子做甚麼，那個寨子做甚麼，每一個寨子都有分工，為領主服役。我最難忘的是曼回寨的個案，過去這類寨子被稱為「琵琶鬼」寨，村民是一些被誣為「琵琶鬼」的無辜百姓。譬如說一個女的，到訪過別人家裏後，人家的孩子就病了，她便可能被污蔑為「琵琶鬼」。「琵琶」在傣語裏是鬼的意思，它會害人、咬人心肝、讓人不得好死。人們會驅趕「琵琶鬼」的家庭，燒光他們的竹樓。這些走投無路的家庭，就只有離開水邊的傣族社群，跑到曼回這類小山溝裏，過著悽慘的日子。1949 年以後，情況當然不同了，但家庭歷史上曾有「琵琶鬼」成員的人還是很難翻身的。譬如，復員後的解放軍是女孩子的理想結婚對象，但是對有過「琵琶鬼」家庭歷史的來說，要找婚姻對象，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拉祜和摩梭地區

雲南地理環境的立體結構是瞭解雲南少數民族的一個重要因素，立體結構的一個向度是氣候，由低地到山上。在夏天，傣族所在的低地，氣溫比較熱，而山上則很涼快，但在冬天，山上就變得很寒冷了。另一個向度是分佈，傣族聚居於低地的平壩上，而有好幾個民族就住在山上。論物質條件，傣族是最優越的，哈尼、布朗、拉祜的情況就差得多了。

1984 年我跟研究生胡鴻保(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一起去研究屬於彝語支的拉祜族和摩梭人，要瞭解他們母系制的區別。我們先去西雙版納，再去瀾滄。拉祜族中有自稱「拉祜納」和「拉祜西」的，拉祜納即「黑拉祜」，親屬組織是父系制，拉祜西即「黃拉祜」，維持著母系制。我們當時集中研究黃拉祜，他們住的地方山巒重疊，沒有甚麼平地，要走好幾個鐘頭才能到達他們耕種的地方，所以他們就在耕地的旁邊，蓋建臨時住房。他們是母系組織，住大房子，在 1950 年代初，當地還有很多大房子，但在我們調查的時候，大房子已經不多了。我跟胡鴻保研究了一個叫紮努、娜波的拉祜家庭，他們家庭成員眾多，除了外出上學和工作的，家裏還有二、三十人，他們的房子是長方型的杆欄式建築，樓上住人，室內分開左右兩側，中間通道有幾個大小不同的火塘，通道兩側分八格，每格之間隔著幾根柱子，沒有板壁，一格就是一對夫婦的「寢室」，中間沒有遮攔。根據我們當時的研究，認為他們正由大家庭向小家庭轉變、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轉變。

在這個地方調查完畢後，我們就離開瀾滄，經大理，去寧蒗，研究摩梭人的母系家庭。當年，該區的車道本已開通，但剛巧遇上全線修復，車走不通，於是我們請了一個嚮導，帶領我們走路前往。但嚮導帶我們走出一片原始森林後，便掉頭回家去，我們就只好自己向前行。穿過原始森林後，站到高山上，瀘沽湖的美景，就在眼下，美極了！真是久聞不如一見。人說西湖美麗，但它是靠人工雕琢。瀘沽湖寧靜非常，波平如鏡，湖水清澈見底，顏色也特別漂亮。無論你向前看、往後看，或從任何角度欣賞，它都是那麼的優美。高原上的湖景，就正如洛克《中國西南的納西王國》(Joseph F. Rock.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一書中的驚嘆：「這簡直是神仙住的地方。」縱然很多電視片和電影都誇說拍得了瀘沽湖的美態，但無論他們如何運用鏡頭和角度，都掌握不了它現場的美。在瀘沽湖邊上有一些村子，當年我們去的時候，衛生不太好，經濟收入也不理想。最近幾年有些發展，現在是一個旅遊景點。

我們去摩梭地區的目的是想看一下，增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感性認識，好跟拉祜族做一個比較。但初期我們的調查不易進行，當地人不滿意有些研究者對摩梭人婚俗過份渲染。幸好我們有一位剛跟摩梭姑娘結婚的普米族學生，我們就由他們倆領著做研究，調查摩梭的不同家庭類型。我們著重瞭解他們的現實情況，譬如當地的單行法規如何解決配偶的結合與認同所生子女出現的矛盾，例如一個女的懷了孕，男的不承認，那麼誰是小孩的父親呢？法院又怎麼判呢？我們調查後知道法院第一是聽女方怎麼說，第二是聽群眾的意見，因為走訪的人晚上來，周圍的人都是知道的。又如改革開放後在發展生產，發家致富的過程中，母系大家庭與小家庭所起的不同作用，母系家庭的發展趨勢等都是我們研究的題目。

1980 年我和庄孔韶等三位研究生去了基諾山和布朗山，這兩個地方也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基諾山離景洪不遠，方圓五百里，那時當地約有一萬多人，那裏的山坡也是非常的陡。我當時已經是五十歲了，大家都要拄著棍子，才能爬上去。那裏沒有平地，更不能用拖拉機耕種。他們沒有種菜，吃的是野菜，也沒有多少肉吃，只養有幾隻雞。基諾人非常熱情的招待我們，我很欣賞他們的螞蟻蛋煮野菜湯，當地的螞蟻比較大，它們的蛋如黃豆一樣，非常鮮美。他們的松鼠乾煮湯也很美味，非常特別。但三位同行的研究生都怕這些食物，他們都不願意品嚐。

布朗山上的拉祜族，女子上身都不穿衣服，她們覺得很自然，但我們自己就看得不好意思。她們都剃光了頭，有稱「光頭拉祜」。她們穿的裙子，有點像傣族的服飾，但比較短，也沒有傣族的那麼漂亮。總的來說，他們是比較貧窮的。要理解少數民族不同的人文類型，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去掌握。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我們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地方，這也是人類學者之所以強調田野工作的原因。

田野工作的艱辛

我調查的少數民族，多分佈在高寒山區，交通很不方便，通常我們去的地方都沒有外面的訪客。楊成志先生曾說：「人類學的路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早年我們就是用兩條腿走，背著行李、帶著被子去跑田野。那個時候，少數民族一家人都是睡在火塘旁邊，天氣冷了便靠近火塘一點，也會不時翻身來取暖，他們也不會有多餘的被子來招待客人。我們就是背著行李走，通常可以坐車到縣城，但離開縣城後，便要開始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了。我們的裝備是一個部隊用的背包，一件由頭頂穿下來的部隊的雨衣，一頂草帽，腳下是一雙布鞋，後來有了解放軍穿的膠鞋和一雙半筒的雨靴。那時做田野研究，除了筆記本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記錄器材。當時國家很窮，一部德國的照相機便要兩千多元，一個組也只有一部，個人用照片做田野記錄是一個奢望。我們那時候很羨慕地質隊員，他們也是到處跑，但裝備卻比我們好得多。

跑田野就是要走路，如果能夠有馬代步，或請馬幫帶運，人就沒有那麼累。但騎馬也是很累的，例如從雲南的硯山到富寧，地圖上沒有多遠，現在坐車很快就到了，當年我們騎馬就走了七天，每天早上天亮就起來，一路上也沒有賣東西的攤販，我們輪流煮粥，沒有甚麼乾的可以吃，起來吃了就走。那裏是熱帶氣候，經常下雨，騎在馬上，一陣子下著傾盆大雨，一陣子就曬得熱騰騰的。下雨的時候，穿了雨衣也沒有用，如果穿上半筒雨靴，靴裏頭便全是雨水。但不管是甚麼情況，我都騎在馬背上不下來，因為下來走路的話，人就更累。在雲南北部，有馬代步，人的精力就好得多。但北部山路崎嶇，走的都是凹凸不平的石頭路，馬在石頭縫隙之間走，有時候走的一邊是山，另一邊是懸崖。但我們當時很年青，不知道害怕，也從沒有想過會掉到山溝裏，只是一心一意向前趕路，要完成工作。現在偶爾在電視或報紙上看到旅遊意外事件，我們幾個當年一起去做調查的同事就會說：「那時候我們怎麼沒掉下來！掉下來就完了！也就沒有今天了！」

年青時跑田野，要帶被子。不過被子也就是馬鞍，我們很會打行李，將油布鋪到地上，然後把可以擠壓的東西都放油布裏頭，然後把周邊摺起來，搭到馬背上，便成為馬鞍。這便是我們騎沒有馬鞍的馬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我們女性跑田野要面對一個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那裏上廁所。山區沒廁所，更不要說一個沒有遮蔽的廁所，無論你蹲在哪兒上廁所，人家都會看見。那時候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穿著長雨衣上廁所，解決這個基本問題，人家看見了我也不管。

在早期的田野工作中，吃始終都是一個問題，在 1950 年代初的調查組裏，吃飽也不容易。當時組裏大多是男生和男老師，他們吃得快，我老是吃不飽。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第一次隻盛半盅飯，我們是用漱口盅盛飯的，吃半盅就比較快，可以首先添飯，這樣，我便能夠吃飽了。當時也沒有甚麼菜，只有辣椒一類的東西。雲南的大頭菜很好吃，我就自己買一點大頭菜，並把它切好，但吃的時候也不敢張聲，怕別人批評我不適應。我就把切好的大頭菜，偷偷的放在手心，在吃飯時放到飯裏。

少數民族地區的老百姓非常熱情，我們做調查不用發愁。 1988 年在廣西賀縣瑤山馬窩村做調查時，住在一位「苗王」的家，他說：「你們需要瞭解甚麼，都包在我們身上。」他們總是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招待我們。到 80 年代初，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做調查也還是相當困難的。 1980 年我與庄莊孔韶等三位研究生去布朗山，當地的公社書記千叮萬囑叫我們不要到老百姓家裏吃飯，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我們就在公社的廚房弄早飯，早上八時多吃了便出發，到了晚上九時回來，早上吃的飯也不知在那裏了。研究生中的程德祺來自農村，本是一位民辦教師，考研究生時，英文和俄文都考了九十多分，他寫得一手好文章，後來成為蘇州大學的教授，但很可惜他兩年前去世了。他在布朗山做田野時對我說：「黃老師呀，我是農村來的，習慣吃飯吃得多，這樣不成的！」那個地方有小賣部，但賣的主要不是食品，當地唯一能夠拿出來

賣的剩餘產品就只有一點長得很小的西紅柿。

人類學者要有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對生活和事物有廣泛的興趣。我就曾經吃過醃了十八年的肉，同行的人都不敢吃。我覺得我們到一個地方，就應嚐一下當地的美食。我們到福建畲族地區做研究時，當地人請我們吃黑皮蛙，他們捉了黑皮蛙，不用宰，把蛙兒在水裏洗一下，煮了便給我們吃，同事都不吃，我就吃了！有些民族喜歡用埕子醃魚、蝦和一些剩肉，經過很長時間才拿出來吃，是一種美味食物，我吃了以後也覺得好吃。我喜歡品嚐各種各樣的特色食品，做一個人類學者，要養成不挑食的習慣，縱使有些東西我們覺得不能進口，也應該嚐一嚐，這才知道那是甚麼味道，知道人家為甚麼喜歡吃。

「文化大革命」時，我所有的調查資料都丟失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沒多久，我們就去了湖北幹校，生活在一般人所理解的「田野」裏。幹校前身是一個勞改農場，之前的勞改犯都遷到其他地方。我們到了後，當地的老百姓都好奇的問我們：「你判幾年呢？」

去幹校的也有老一輩的學者，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先生跟我們在同一個連隊。稍後，吳文藻先生的太太冰心也來了，我們都在一起勞動。有幾個月我在廚房做飯，同組的費孝通先生負責做饅頭，我就炒菜。費先生做的饅頭特別大，很鬆軟的。當我炒菜時，人家便說：「今天是黃淑娉炒菜，你要把那個菜炒得綠綠的，要看到油水！」那時一個月每人平均只分配半斤食油，要把菜苔(菜心)炒得綠綠的，需要有點技術！

田野工作給女性帶來不少困難，我的一些女同學在畢業後很快便結婚了，結婚以後就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不能跑田野了。我就是不願早結婚，結了婚也不能馬上生孩子，我有一個兒子，是三十多歲才生的。有一次在中老邊境進行田野研究，兒子滑冰摔了腿，我很擔心，但我不能即時坐飛機回去，真是沒辦法。由於田野調查時間長，每次回來後都覺得身體上有很大的虛耗。此外，自己還要克服家庭和感情上的困難。我一個人離開香港到內地，這幾十年，香港的家人都不在左右。80 年代末遷回廣州，很高興終於能靠近香港一點，但家裏人卻已經先後移民外國了。改革開放後，我回香港探親，但父母親卻已經逝世，我感到很悲痛。我是臺山人，但是臺山也沒有親人。香港是我的故鄉，發愁時會想香港的家人，夢境裏出現的，就是小時候在香港居住的地方。自己要克服家庭、感情上的這些矛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結婚以後，我先生和兒子對我的研究是十分支援的，但我這一輩子也只能生這一個孩子。我常說：「我一個女的，如果要做事情，第一便不能多生孩子，第二不能把自己弄得很窮，因為我們的工資很少，太窮的話，也沒有心思去做甚麼研究！」總的來說，我經過了幾十年的學習和工作，雖然業務上沒有多少成績，但是田野調查工作，卻讓我的思想得到很多鍛鍊，田野的經歷激勵了我對人類學事業的終生追求。

我覺得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必須重視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並且將理論結合實踐。理論是一個學科知識結構的核心，有了理論，我們才能夠駕馭搜集回來的資料，要不斷的瞭解這個學科發展的趨勢，才能知道自己該怎麼辦。田野調查是很微觀的研究，容易迷失，我們要在宏觀的視野下做微觀的研究，才會有成果。在人類學的棋盤裏，我們是哪一顆棋子，要起甚麼樣的作用？我們要抓得準的話，理論上就必須要領先。

中國的人類學被取消了 30 年，我曾為所從事的學科的坎坷命運、為作為人類學者經歷過的蹉跎歲月深感惋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常為我國人類學的這些損失感到遺憾，但對自己走上探索人類學奧秘的田野之路，始終無怨無悔。

許多前輩都不顧艱辛，堅持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後。現在中國人類學正在復興，但根基還是非常脆弱。一些前輩已經離去，一些也老了，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有責任把棒接過來，交給下一代。我們要繼承前輩的這個事業，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努力。現在是中國人類學發展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我要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盡一分力量。